

地域文化与文化区域的文化研究

——“黔中文化研究”的科学价值取向问题

赵 心 宪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系,重庆 400067)

摘 要:重视“黔中文化研究”的科学价值取向维度,符合学术规范正确阐释与之相关的“地域文化”、“文化区域”与“文化研究”三个核心概念内涵,并科学应用于“黔中文化研究”的学术实践,可持续推进“黔中文化研究”,为渝东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关键词:黔中文化研究;地域文化;文化区域;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2)06—0063—07

一、问题的提出

通读《黔中文化研究文集》^[1](以下简称《文集》),有关“盛世黔州,书香彭水”的地域推介文字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时激起在此书思考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的热情。

《文集》内容丰富,“序言”“后记”之外,33篇研究文章共分四辑:“黔中文化综合研究”(第一部分)、“历史钩沉”(第二部分)、“地域文化”(第三部分)和“考证辨析”(第四部分),研究的整体思路清楚。第一部分“综合研究”不同于后三部分的地方,正如《文集》以题为《走进黔中文化》的“代序”所指出,对“黔州文化”与“黔中文化”比较分析时强调的是文化层面认识的不同:“以前我们所说的黔中文化,严格说来是在研究黔中治所的文化,即彭水的文化(即上文‘黔州文化’——引者)。而真正意义上的黔中文化,则应当跳出彭水,站在更高层次来俯瞰审视。通过跳出彭水,放宽视野,一个全新的黔中文化轮廓,就逐渐明了和清晰了。第一,历史上的黔中道,横跨今鄂、湘、黔、桂、渝三省、一区、一市,220余个区、市、县,近30万平方公里,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单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区域文化。是渝、鄂、湘、黔、桂各族人民的宝贵遗产和精神财富;第二,黔中文化与巴渝文化、荆楚文化、潇湘文化、牂牁夜郎文化、岭南文化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挤压的关系。研究和弘扬黔中文化,是对上述文化的增益、补充和完善,而不会影响和割裂上述文化;第三,黔中文化具有其典型的地域特征和多彩的民族文化印迹。内容博大精深,形式丰富多彩。初步分析,它至少包涵以下内容,即: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盐丹文化、羁縻文化、流放文化、军屯文化、迁徙文化,以至于近现代的红色文化。”因此,“黔中文化是以区域本土文化为基础,盐丹文化为核心,外来文化为补充,民族文化为表现形式,内涵丰富,特色鲜明,与巴渝文化、荆楚文化、潇湘文化、牂牁夜郎文化、岭南文化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互为支撑,多元驳杂的一种独立的文化存在”。

“黔中文化研究”从黔中治所即今天的彭水地域展开去,涉及历史上面积广达30万平方公里的黔中道行政辖区“地域”问题,首先与历史上“黔中”作为地域文化的若干史实密切关联,需要一一考证

收稿日期:2012-09-24

作者简介:赵心宪(1948—),男,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系,教授。

落实;其后作为区域文化形态研究的“黔中”,是在研究者们不同观念认识的实际比较中出现的,各有各的道理,从根本上说,与“黔中文化研究”各个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分不开,需要站到彻底解决这个研究项目“顶层设计”的哲学反思层面。“价值取向是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取向……价值取向的突出作用是决定、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因而对主体自身,主体间关系,其他主体均有重大的影响。”^[2]价值取向的界定有多种说法,以上表述内涵清楚,简明可取。在笔者看来,重视“黔中文化研究”的科学价值取向维度可能是可持续推进“黔中文化研究”的核心命题,应该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一般而言,科学价值取向的维度包括:社会性(人生价值取向核心的核心)、科学性(能够正确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可行性(包括素质、性格、潜力等主观因素和社会政治制度与经济条件的客观因素)与超越性(能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主体的积极开拓和拼搏精神)等四个方面。面面俱到阐述“黔中文化研究”有关这四个方面的认识实践问题留待以后解决,本文重点解说与之相关的“地域文化”、“文化区域”与“文化研究”三个核心概念在“黔中文化研究”科学性方面的粗浅认识和理解,借以提出“黔中文化研究”的科学价值取向问题。一己之言,抛砖引玉,欢迎批评斧正。

二、地域文化概念界定的内涵要点与“黔中文化”命名

地域文化虽然是当下学界使用频繁的概念,但其内涵界定普遍存在的模糊性是通病。即使某个地域的空间指代是清楚的,与“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内涵模糊的“文化”构成一个组合概念——“地域文化”,其具体内涵不但非常复杂而且难以言说到位。但研究者如果学科依据清楚,先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对“文化主要是对人的行为和思想的教化”,这个数千年形成的传统文化知识核心的社会学原则;同时也接受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学界普遍认同的“文化是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的人类学精髓,兼顾以上文化认识的两个学科维度,面对众说纷纭的地域文化界定,就可能把握住这个文化范畴的内涵要点,这也是提升黔中文化研究科学性的关键步骤。

从研究状况来看,近年关于地域文化三种内涵模糊的界定意见,比较引人注目——

第一种说法,认为地域文化是带有空间范围限定词的文化,因此,地域文化“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与文化地理学大同小异”(甚至有研究者干脆因此称之为“区域文化”,“地域”不就是一种“区域”吗?)。把地域文化概念的“文化”要素直接依附于“地域”,其内涵的模糊性在于,“地域”道不清楚,所属“文化”当然也就说不明白;甚至地域有了明确认定,相关文化依然是一笔糊涂帐,因为文化的存在是动态的历史过程,不加上特定地域历史源流的追踪,这个“地域文化”概念仅仅是一个界说模糊的“地标”而已。

第二种说法,地域文化被概括为特定地域的“一种文化传统”,所谓地域文化“是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这种概括的模糊性在于,注意到文化内涵的一端,即文化传统中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英文化三大传统随着时间流逝变动不居的常态,虽然典籍上有案可查,白纸黑字的存在却是过去时的静态记录,而“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一般不可能是历史上记载的传统本身,民众的民俗文化传统极富于生命活力,因为日常生活化,似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难以把握。

第三种说法,把地域文化等同于特定区域“人文精神的体现”：“地域文化应当以地域为基础,以历史为主线,以景物为载体,以现实为表象,在社会进程中发挥作用的人文精神。”^[3]如果把地域文化比喻为一座看不清底部的巨大冰山,地域文化是一个地方人文精神的存在的判断,那就只注意到了地域文化“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因为研究主体认识视角的形而上定位,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被不经意间蒸发掉了,由此造成概念内涵界定的模糊性。

有研究者认为,要避免以上三种概念内涵界定的模糊性,应依据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知识原理,可以把地域文化概念界定为:“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而不同地域内人们

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不同,导致地域文化的差异性。”^[4]这个界定把握住了地域文化概念“地域”要素理解的地理(空间)与历史(时间)两个基本要点——(1)地理性。“一定空间范围内”(不同的“一定空间范围内”就是“不同地域内”);(2)历史性。特定人群(历史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的社会性)“人的关系总和”的社会形成历史。更重要的是,这个界定把特定地域的地理历史特征,通过“特定人群”“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存在与“文化”的本质规定整合起来。在确认“地域”认识的同时关联“文化”的特质生成,由此言简意赅地阐释清楚了地域文化概念核心内涵的本质规定性。我们可以清楚了解的是,所谓地域文化,是活动在研究主体头脑中的抽象概念而不是某个地域的现实具体存在,换言之,地域文化概念需要理论思维的积极逻辑演绎才可能得到明确的内涵把握。这样,上述界定转换为以下比较通俗的解释,也就不难理解了:“地域文化是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文化研究,其地域(Region)概念通常是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它在产生之初,是精确的,但由于漫长的历史逐渐泯灭了它们的地理学意义,变得疆域模糊,景物易貌,人丁迁移,只剩下大致的所在地区了。如‘齐鲁’概指山东,‘关东’泛指东北等。在这里‘地域’与‘地区’的概念是有区别的,这是地域文化与文化地理学的差异之处。”我们应注意的是,“岁月的流逝虽然改变了古代区域的精确性,但这种模糊的‘地域’观念已经转化为对文化界分(即文化区域的界限划分——引者)的标志,深深地积淀在人们的头脑之中,并且产生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显然我们不应忽视或轻视这个文化范畴的存在。”^{[5](2)}地域文化中的“地域”确认如此这般复杂,“疆域模糊”,是因为经历了绵邈的历史过程,这个“地域”已经由可“精确”定位“特定的地域”,转化为“特定地域的文化范畴”(即文化区域)。简言之,一个明确的地图上可查看的地理学的“地名”,因为时代社会变迁的历史原因而转化为承载人们认识积淀的文化学范畴,“大致的所在地区”不但实际地理位置游移不定,同时经历着文化变迁的内涵扩充、性质变化,成为了“地域文化”。

这样,我们对于地域文化概念内涵的认识应该注意以下两个要点:1. 地域文化是一个“文化范畴”,“是活动在研究主体头脑中的抽象概念而不是某个地域的现实具体存在”;2. 地域文化是以交叉学科“历史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文化研究”,研究的重心所在,是“一定空间范围内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正如《黔贵文化》编者所说:“地域文化的形成不外乎两种主要因素,一是自然环境,一个是社会结构(包括社会结构的历史形成及其文化变迁——引者)”,“自然环境不但影响一地的风俗民情,更影响着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甚至民居建筑,它对于一个地域文化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5](3)}也就是说,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再关注地域文化的形态分类,就可以做到高屋建瓴,心中有数。不管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三分类比,或者是器物文化、通俗文化、制度文化、精英文化的四分类比,以及“地域文化是研究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特定人群文化的起源、发展、功能,研究其行为、信仰、习惯、社会组织,以及通过这些反映的地方性,是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文化学,涉及文化学方法,又借助地理学手段”^[4]的地域文化研究内容的阐释,都可以拿来指导研究实践。

“黔中文化”的命名,正是历史文化学者特定地域文化研究的产物。四川大学任乃强教授首先提出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地域文化概念明确的内涵认定。正如蔡盛炽先生《“黔中文化”初探》一文,所解读的以盐丹文化为内核,唐代开元年间“黔中道”(治所彭水)所辖地域的历史文化特征。但这个“黔中文化”范畴在不同研究者的地域文化研究中,因为赋予了研究主体各个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对应的史籍考证,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各执一词,内涵歧义的学术范畴了。例如贵州安顺学院学报近年发表的系列论文,如石恪《魏晋南北朝时期黔中文化的发展状况》对贵州以贵阳、安顺为中心区的黔中地域文化的探讨,^[6]以及刘建治、颜建华等相关的研究论文推出的一批研究成果。如何评价这样的研究项目呢?在笔者看来,黔中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本质规律性认识需要提升、扩充到位,应该认真学习国内学界的区域文化研究成果,接受“文化区域”的观念知识。“黔中文化研究”作为文化研究的规律性认识,通过文化区域概念的深入领会,或有可能进一步明确并有效运用于研究黔中文化的学术实践。

三、文化区域概念内涵的界定要点与“黔中文化研究”

地域文化的文化范畴使用,是把一个特定地域(主要以自然地理为基础的区域)的自然文化与人文

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性文化形态来认识的,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域与文化区域转换关联关系的认识,成为地域文化作为文化范畴科学运用的前提条件之一。

有研究者指出,上述“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域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区别,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于较不明确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7]行政区域的行政区划和自然区域的自然区划都有明确的权威地图作为依据,而文化区域的存在多数是一种学术精英认识上的观念形态,种种说法而已。因此,文化区域设定的主观性较强,只要有历史地理的基本根据,甚至可以是一个研究者一种角度的设定。新时期学界所谓“滇黔文化”与“黔贵文化”的文化区域命名,就是例子。前者围绕黔中文化相关的行政区划和自然区划,重心置于云南和贵州,所以称之为“滇黔文化”;后者围绕黔中文化的行政区划和自然区划,研究中心置于贵州,称之为“黔贵文化”。这样的黔中文化的“地域”研究,就是文化区域范畴在地域文化研究中运用的典型例子。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方案,但由于其所依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曾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7]黔中文化不是一个自然区划,但所依据的黔中地域“确定的自然环境”是可以在地理文化学上求证的。

我国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区域,属于大陆性气候,不同地域农耕和游牧的生产方式,导致文化特征和行为系统出现两类“模式”的区别。正是因为自然地理的状况造就了不同的生存环境、社会结构和人文素质,从而促进文化区域模式化的形成。从旧石器时代到“三代”之前,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在这漫长的文明进化中得到和谐汇融,从而出现四大文化区域模式。

1. 以渭水和潼关以下黄河为轴线的“中原”文化区域系统。自然地理环境为,东面大海,西至经渭上游的陇山山脉,北接蒙古草原,南界秦岭、汉水上游及淮河一线。巨型扇状文化区域从西部向东部展开,大部分是平原和丘陵地带,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有适于农耕的大片土地和丰富水源,其良好的自然环境,成为人类最古老的发祥地之一。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由此延伸的半坡文化、姜寨文化类型揭开华夏文明的序幕,是我国魏晋以前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2. 以滇北长江以下为轴线的“南方”文化区域系统。东临大海,西拥巴蜀,南至南海,北依中原。海岸线长,纬度低,气温高,无霜期长,受海洋季风气候影响雨水充沛。农业条件很好。其自然环境的主要局限在于,地形复杂山陵多,河湖水区广,受科技水平限制的古代因此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内外文化交流受到严重影响。同时良好的生存环境也是虫蛇野兽的天堂,瘴气瘟疫盛行阻碍文明的发展,与中原文化区比较,差别很明显。“南方”文化区系正是黔中文化出现的自然地理与人文文化“语境”。

3. “隔中原与南方文化区系相对应”的北方文化区域系统。实际自然地理环境约以蒙古高原为中心向外延展,其文化形态东部延伸到白令海峡,西达阿尔泰山,北到贝加尔湖,西至西伯利亚南部,南抵辽河流域山海关一线及长城北部的燕山山脉之末。基本上属于大陆性温带草原气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蒙古高原气压中心,亚洲季风气候冬季寒潮来源地之一”。气候干燥而寒冷,雨水资源不足,草原辽阔,山脉逶迤,松辽平原水源也不成问题,由于气候常年太低,雨量并不充沛,农耕艰难,自古以畜牧业为主。这个文化区域南接中原文化区系的“过渡带”农业因素与狩猎游牧经济并存,正是后期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

4. 青藏高原文化区域系统。“天气寒冷,空气稀薄,不利于远古文化的发展,古文化遗址少而单一,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十分少见,新石器遗址也是晚期居多”,多集中于青海东部,青藏高原的东缘,沿黄河上游地区,也正是中原、蒙古和青藏三个文化区域系统交汇地带。^[3]

推动黔中文化诞生的“南方”文化区系的形成,自然区域与行政区域的划分是两大缘由,自然区域的地理学划分,依据的是具体的自然环境条件,属于造化所赐,无可更改,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对

其认识从宏观到微观只是越来越准确、深刻而已；行政区域的划分，却是历朝历代经常发生的事情。为什么？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时代政治需要。或许，关于“黔中”地名沿革的考证资料，可能从一个特定的角度阐明上述观念。

始皇帝于公元前 221 年统一中国初期，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可查始皇二十六年最南边的是蜀郡、黔中郡、长沙郡、巫郡、会稽郡，相当于今天的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浙江。即秦王朝的“南方边界”。约西起今四川、成都、重庆，经贵州的思南、黎平，湖南的靖州、郴州，江西的南昌，安徽的宁国，到浙江的绍兴一线。黔中郡为秦始皇的行政区划之一，郡治故城在沅陵县西。湖南辰州、常德、永顺、澧州诸府州，及贵州旧黎平、思南诸地皆其所辖。

汉高祖五年（前 202 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郡治湖南溆浦县（据林剑鸣《秦汉史》）。

隋统一中国后，重新调整行政区划。全国共分 190 郡。其中武陵郡郡治武陵，领县五，为湖南及与贵州交界处的铜仁、江口、万山等地。黔安郡治四川彭水，领彭水、涪州二县，所辖之地有今贵州的沿河、务川、思南等地。

唐代，今贵州大部分属黔中道黔中都督府，府治彭水县。唐高祖武德元年（618 年），改隋置黔安郡为黔州，州治彭水。高祖武德四年（621 年）以隋置巴东郡务川县置务川郡，领合川、涪州、扶阳三县，思南属其辖地。唐太宗贞观四年（630 年），改务川为思州，拔涪州、扶阳入费州。思南属涪州，从思州划出入费州。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 年），黔州都督府领思州、费州等 15 州。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 年）改黔州为黔中郡，治彭水，史称“黔州黔中郡”；同年改思州为宁夷郡，史称“思州宁夷郡”；改费州为涪川郡，史称“费州涪川郡”，思南为其所属。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 年）复为思州，思南时属费州；又将黔中郡改为黔州，治彭水，领地在今四川与贵州交界处；同年又将涪川复名费州，治涪川县，领涪川、扶阳、多田、城乐 4 县；涪川县在今思南，扶阳县在今德江，多田县在今思南、德江之间，成乐县在今凤冈、思南、德江的边界之地。

宋、元、明、清时期史籍中“黔中”建制文字资料缺佚。

民国二年（1913 年）置黔中道，治贵阳县，属贵州省，辖 31 县。国民政府成立后裁撤（民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以上抄录的资料仅仅是关于“黔中”建制历代变化的线索，其中的经济、政治、文化原因搁置不论，黔中文化圈的地域所属确实可以在地图上看个大概。如果特别注意到汉高祖二年（前 205 年）设置武陵郡，汉高祖五年（前 202 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武陵郡设置的行政区域竟沿用至唐乾元元年（758 年），历时长达近千年（共计 963 年）以后未再使用的史实，非常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其行政区划的文化区系内涵就值得深入探究了。依据上述黔中“地域”的历史变化线索，可以明确如下两个深化认识“黔中文化研究”的相关判断。

其一，历史上三个时期的行政区划对于形成黔中文化都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1）先秦时期的秦、楚黔中郡设置；（2）唐代时期的黔中道设置；（3）民国初年的黔中道设置。而以唐文化在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唐代黔中道设置对于黔中地域文化的成型可能最为关键。

其二，历史上“黔中”治所所在的地理位置在上述三个时期是比较明确的。秦、楚黔中郡治所的具体位置虽然需要进一步考证，但在湘西沅水（源头所在地）流域确凿无疑；有唐一代治所彭水与民国初年治所贵阳更无争议。

或者可以这样认为，黔中文化形态的形成，历史上可以找到三个行政区化影响最大的自然地理“源头”：秦、楚黔中郡治所所在地域的沅水（“黔中文化”历史地理最古的源头当在今重庆彭水的郁山镇，已被四川大学李映发教授的考证所证明。本文所提出的沅水的源头地位，是从国家行政区划的实际影响而言的），唐代黔中道治所所在地域的彭水，民国初年黔中道治所所在地域的贵阳。三个“源头”以时间为序，如长跑接力不断加速生成今天博大精深的黔中文化形态。特别值得我们研究者高度注意的是，这三个“源头”所在地域都属于武陵山脉的核心区。如果说，“南方”文化区系是黔中文化发生的自然地理与人文社会的文化生态基础，那么大武陵山区域（武陵山脉为核心地带）正是黔中文化诞生的地域母亲。“南方”文化区系是华夏文明的大文化区域，而大武陵山区域正是“南方”文化区系中独具个性的

“小文化区系”(或者更准确地称之为“亚区域文化”)。如果不是从这个视域观照黔中文化生成的历史,“黔中文化研究”因为“顶层”意识模糊可能后劲乏力。

四、经济文化一体化:“黔中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

地理学规范的武陵山脉描述如以下的文字:

盘踞湖南的西北角,属云贵高原云雾山的东延部分,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山系北东向延伸,孤顶突向北西。新华夏构造叠带之隆起,海拔在1000米左右。峰顶保持着一定平坦面,山体形态呈现出顶平、坡陡、谷深的特点。最高峰壶瓶山,海拔2098.7米。武陵山脉原生地貌发育自北向南分为三支。

北支:分布于湘、川、鄂边境的八面山、八大贡山、青龙山、东山、壶瓶山;

中支:沿澧水干流北侧,有天星山、仁星山、朝天山、张家界、白云山等;

南支:从贵州省境延伸过来,进入湖南省的有腊尔山、单峰山、天门山、大龙山、六台山等,为武陵山脉的主脉,是澧水与沅水的分水岭。

上述三支山脉均消失于洞庭湖平原。武陵山脉纵贯湖南省西部,成为东西交通的屏障,但局部地段有较低的山隘,如洞口等地,构成东西交通的通道。

这是武陵山脉“自然区划”的地理描述,如果从文化区域的视野审视,沅水、彭水与贵阳,在大武陵山区历史上的政治行政区划,加上战争、移民、文化浸润诸要素的共谋,“文化区域”化的意义就应该特别注意了。

有专家指出:“传统文化最初的形成和表现,完全是以地域为基点而展开的。在远古时代,生活在我国境内各地区的先民们,就基于自身的生存环境和人文素质,创造了符合自身特征和环境特征的各类文化。因其不断改造和利用生存环境,就使文化带有强烈的地域性色彩;因其按照自己的素质去创造自己的生活,就使文化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色彩。地域性表现为生存空间的固定,民族性又在历史的长河中凝聚,文化的时空,是文化滋生、发展的前提和必备条件。”^[8]可见,“黔中文化研究”首先应注意黔中文化地域的研究。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生成的基因之一,黔中文化形成的地域“基点”“源头”当然应该有清楚的认定,文献学、地方志的研究价值应得到充分的展现。其次,更值得深入探究的,是从这个地域基点上展开的,“强烈的地域性色彩”与“强烈的民族性色彩”有关“文化时空”创造的悠久历史过程。“黔中文化研究”特别关注的“文化时空”,似应为中华文化传统形成的历史长河中,大武陵山区(武陵山脉为核心)地域相关的文化空间,即武陵山区成为“文化区域”的历史认识。这有相当的难度。因为文化区域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是游移的,“区域文化的形成及发展,都是一个过程。它的文化是由地域性限定了的文化,而所谓的地域(即区域文化‘区域’划定关系的地域——引者),也是由一种文化所笼罩下的地域。文化的模糊性往往使‘区域’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界定,尤其是在各个区域文化的交汇地带。这些交汇地带在区域文化的早期,由于地形的制约和人口稀少的原因,还可以从文化的空白限定各个区域文化的固定范围。但当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这些地带便不可避免地带上文化的色彩,这些文化也往往是中和性的文化。它夹处于两种或两种以上区域文化之间,在历史的岁月里,它的属性,它的地理范围摇摆不定,表现出‘亦此亦彼’的特征。”^[8]

“文化区域的游移性”,当然是文化区域预设者的主体感受。以文化区域观念认识的“黔中文化”为例,沅水(源头)、彭水与贵阳,在大武陵山区历史上行政区划的文化关联,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命题。彭水位于当下直辖市重庆的渝东南,沅水(源头)在湖南的湘西地区,贵阳是贵州省的省会。它们的文化关联,是在“武陵山文化区域”中隐形存在的。明清以后这种文化关联关系,因为历代国家战略多次大规模移民的主导原因,三地之间的文化交汇地带由疏远而亲密,共同的武陵山文化区域特征越来越清晰而引起学者们注意。一言以蔽之,国家行政规划的力量,使其“武陵山文化区域”的范畴有了形成的基础。汉唐时期的羁縻制度、宋代开始的土司制度与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中央政府的政治行政规划成为“武陵山文化区域”生成的关键步骤之一。而2011年国务院批复的《武陵山片区2011——2020扶贫攻坚规划》的正式颁布,可以认为就是当下“武陵山文化区域”的国家战略性规划。这个规划

的现实意义或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笔者看来,这个规划是涉及经济扶贫,更是文化扶贫,就是“黔中文化研究”深入开展的国家指南。限于篇幅,简要提出如下三个方面。

1. 符合地域文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三阶段研究目标推进的规律^[3]。第一阶段,原始部落时期的地域文化研究;第二阶段,方国时期的地域文化研究(如巴国文化);第三阶段,行省辖区命名的地域文化研究(汉唐到明清、民国)。

2. 符合地域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文化研究本来就是一种更加综合性的学术视域,它是对哲学、宗教、政治、伦理、艺术、民俗及社会心理等学科研究对象的综合思考。”^[9]文化区域的研究,当然只有应用这种综合性的学科视域才能有比较科学的认识。

3. 符合经济社会一体化“全球化”发展的国家战略调整及其实际体现的渝东南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重庆市“一圈两翼”的中国第五大中心城市发展战略,大大提升了渝东南所在武陵山区域发展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渝东南地域文化将作为我国新型工业化城市重庆文化多样性保护、发展、利用的精彩展示的大舞台。

参 考 文 献

- [1] 汪家生. 黔中文化研究论集[C].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0.
- [2] 百度百科, 2012—03—26.
- [3] 李建平. 关于地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J]. 人民网, 2006—01—14.
- [4] 张凤琦. 地域文化概念及其研究路径探析[J]. 浙江社会科学, 2008, (4).
- [5] 黄涤明. 黔贵文化[M].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 [6] 石恪. 魏晋南北朝时期黔中文化的发展状况[J]. 安顺学院学报, 2009, (1).
- [7] 周振鹤. 中国历史自然区域、行政区域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OL].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中学历史在线 2004—10—01.
- [8] 李勤德. 中国区域文化·绪言[M]. 山西高校出版社, 1995.
- [9] 何勇强. 区域文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浙江文化研究为例[J]. 浙江社会科学, 2008, (4).

On Local Culture and Cultural Region: the Scientific Value – Oriented Issues Concerning Qianzhong Cultural Research

Zhao Xinxian

(School of Literature Media,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To uninterruptedly promote Qianzhong cultural research, much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dimensions of the scientific value orientation. Three core concept connotations related to it including local culture, cultural region and cultural research, which need to be explicitly and academically interpreted and applied in academic practice concerning Qianzhong cultural research, which ultimately serves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in southeast Chongqing.

Keywords: Qianzhong cultural research; local culture; cultural region; cultural research